

百人百部



雲南文庫



当代云南社会科学百人百部优秀学术著作丛书

中国西部国际直接 投资吸收能力研究

赵果庆/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

百人百部

当代云南社会科学百人百部优秀学术著作丛书

中国西部国际直接 投资吸收能力研究

赵果庆/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西部国际直接投资吸收能力研究/赵果庆著.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2

（当代云南社会科学百人百部优秀学术著作丛书）

ISBN 978 - 7 - 5482 - 0895 - 2

I. ①中… II. ①赵… III. ①国际直接投资—研究—

西北地区 ②国际直接投资—研究—西南地区 IV.

①F83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54007 号

责任编辑：刘 焰

装帧设计：刘 雨 王睿韬

责任印制：张爱成

书 名	中国西部国际直接投资吸收能力研究
作 者	赵果庆 著
出 版	云南大学出版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650091）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650034）
电 话	0871 - 5031071 5033244 0871 - 4113185
网 址	http: //www. ynup. com www. ynpph. com. cn
E - mail	market@ynup. com rmszbs@public. km. yn. cn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320 千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 - 7 - 5482 - 0895 - 2
定 价	50.00 元

作者小传

赵果庆，男，1964 年出生，白族，云南鹤庆人。2004 年毕业于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是云南省自己培养的首位经济学博士；2004—2006 年在南开大学理论经济学读博士后；2006—2008 年任南开大学副研究员；现为云南省数量经济学术带头人与后备人才，云南财经大学特聘教授，数量经济方向硕士生导师。在《管理世界》、《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和《中国软科学》各发表论文 2 篇，EI 索引 2 篇；在《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财贸经济》、《统计研究》等重要期刊发表论文共 10 篇；出版学术著作 2 部，合著 3 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9XJL015）研究。获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4 次，国家统计局等省部级奖 7 项。主要研究方向为数量经济、国际直接投资、产业经济学。

《云南文库》编辑说明

《云南文库》是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的重大项目。编辑出版《云南文库》是落实云南省委、省政府建设民族文化强省的重要举措，是繁荣发展云南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途径，是树立云南文化形象、提升云南文化软实力的基础性工程。

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不仅有共性，还有很强的地域性。一国有一国之学术，一方有一方之学术。学术研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社会智慧的结晶，是文化建设的重要构成部分。云南虽地处边疆，仍不乏丰厚的学术研究传统。尤其明清以来，云南与中原的文化交流日臻密切，省外名宿大儒进入云南的代不乏人，而云南的文人学士也多有游宦中原者。在中原文化的熏陶下，云南的文化学术遂结出累累硕果，文化名人辈出，如杨慎、李贽、李元阳、师范、王崧、方玉润、许印芳等，其总体集中性的代表成果是《滇系》和《云南备征志》。至清末，云南学子开始走出国门到海外留学，成为云南与世界沟通的桥梁，也成为改造社会和推进云南文化学术发展的中坚。但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云南的学术成果并未为内地所认知。更有甚者，清乾隆年间，四库全书馆在全国征集历代遗书，云南巡抚李右江得到云南先贤的著述，但害怕其中有什么不恰当的内容，竟私藏起来不上报，使得《四库全书》仅从它处收录了3种云南人著述，成为云南文化史上的一大缺憾。辛亥革命后，云南学人痛感地方文化学术之不彰，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赵藩、陈荣昌、袁嘉谷、由云龙、周钟岳、李根源、方树梅、秦光玉等一批当时最负盛名的云南学者倾力收集整理云南文献，于1914年至1923年编成刻印《云南丛书》初编，共152种1064卷，及不分卷者47册；1923年至1940年编成刻印《云南丛书》二编，共69种133卷。另编定31种待刻，后由于抗日战争爆发，整个《云南丛书》的编辑刻印工作中止。历时26年编刻的《云南丛书》把保存下来的历代云南重要地方文献网罗殆尽，是云南有史以来地方文化的一次最系统的总结，对云南的文化建设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学术创新的根基是学术积淀和传承。从编辑刻印《云南丛书》之时

算起至今，其间经历了抗日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在这近一百年的历史中，云南的学者为抗击日本侵略者和新中国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也为云南地方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创造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色。今天，文化建设又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整理和出版云南学术史和文化史上的优秀成果，是继承优秀的地方历史文化遗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和民族文化强省的基础性工作。只有站在前人的肩上，我们才看得更远，走得更实。这也是我们编辑出版《云南文库》的初衷。

比之编刻《云南丛书》的时代，云南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云南不再是一个封闭落后的边疆省份，而是成为了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桥头堡，其战略地位日益突出。云南的文化创造力也大大发展了，学者力量的壮大、学术成果的丰富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今天的《云南文库》不可能像当年《云南丛书》一样收录所有的文献资料，只可能是好中选优、优中选精，尽可能地把最能体现云南学术文化水平和云南学术特色的成果收录进来，以达到整理、总结、展示、交流和传承文化，弘扬学术，促进今日云南文化学术的建设与繁荣之目的。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云南文库》分为三个系列。

一是《云南文库·学术大家文丛》，收录云南学术大家的作品。

二是《云南文库·学术名家文丛》，收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出生的云南学术名家的作品。

三是《云南文库·当代云南社会科学百人百部优秀学术著作丛书》，收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出生的一代学者的优秀作品。

我们将使《云南文库》成为一个开放的体系，随着云南民族文化强省建设的推进而不断丰富它的内涵，不断发挥其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云南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云南文库》编辑委员会

2011年6月

目 录

第一章 导 言	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1
第二节 研究现状	6
第三节 研究对象	7
第四节 研究方法	10
第五节 关键概念与结构	11
第二章 FDI 吸收能力理论假说	17
第一节 相关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17
第二节 区域 FDI 吸收能力与结构	25
第三节 FDI 吸收能力系统复杂性机制	37
第四节 FDI 吸收能力与欠发达区域发展	43
第三章 区域 FDI 吸收能力评价	47
第一节 区域 FDI 吸收能力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47
第二节 区域 FDI 吸收能力评价与检验	56
第三节 我国地区 FDI 吸收能力分布规律与分级	63
第四节 FDI 吸收能力结构分析	67

第五节 地区 FDI 与 FDI 吸收能力的计量分析	70
第四章 西部 FDI 引进能力	78
第一节 西部发展阶段与 FDI 引进能力	78
第二节 西部 FDI 引进能力与自然资源悖论	86
第三节 周边国家对西部 FDI 引进能力的影响	97
第四节 西部 FDI 引进能力的结构特点	102
第五章 西部 FDI 利用能力	111
第一节 西部技术发展阶段与 FDI 利用能力	111
第二节 西部创新能力空洞化	121
第三节 工业结构与 FDI 利用能力	127
第四节 西部资源配套能力	134
第六章 西部 FDI 扩散能力	153
第一节 FDI 扩散途径与机制	153
第二节 FDI 进入西部方式	160
第三节 西部产业结构 FDI 扩散能力	166
第四节 西部制造业技术扩散能力	171
第五节 西部学习能力	188
第七章 中国区域 FDI 系统的动态经济分析	195
第一节 区域 FDI 竞争力动态系统	195
第二节 区域 FDI 竞争力动态系统模型及解析	200
第三节 区域 FDI 竞争力系统的稳定性分析	207
第四节 西部 FDI 与 GDP 动态经济分析	219



第五节 提高西部 FDI 吸收能力的意义	226
第八章 西部提升 FDI 吸收能力的战略途径	229
第一节 西部 FDI 吸收能力提升的战略体系	229
第二节 增强西部企业研究与开发能力	236
第三节 加快西部高新技术开发区发展	243
第四节 加快西部人力资本形成与累积	250
第五节 政策措施	260
第九章 结 论	272
参考文献	276
附 录	284
后 记	288

第一章 导 言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东西区域发展差距相对稳定,而从1990年开始,我国东西区域发展差距逐步拉大(胡鞍钢,2001)。我国区域GDP增长率差距导致区域GDP份额及人均GDP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GDP份额看,1978—2002年东部的GDP份额上升了7.55个百分点,而中部、西部分别下降了3.94和3.62个百分点,东部、中西部的GDP份额差距有扩大趋势。^①从人均GDP看,东部、中部和西部的人均GDP增长率分别为14.44%、13.88%和12.88%,东部人均GDP净增16838元/人,中部和西部分别净增7209元/人和5351元/人,东部的人均GDP增量分别是中部和西部的2.34倍和3.15倍,中部为西部的1.35倍(见表1-1)。因此,相比较而言,中部与西部GDP份额的差距不明显,而东部与西部差距却很大。西部地区经济份额下降,发展严重滞后,已对我国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以至国家安全都带来了新的挑战。西部发展问题已成为中国21世纪的头号问题(胡鞍钢,2001)。

^① 东部: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广东、江苏、福建、辽宁、山东、河北、海南;中部:安徽、江西、黑龙江、湖北、吉林、湖南、河南、山西;西部:青海、重庆、宁夏、四川、陕西、云南、广西、甘肃、贵州、内蒙古、西藏、新疆为西部大开发的12个地区。

表 1-1 1978—2002 我国区域人均 GDP 与 GDP 变动情况

指标		1978	1992	1995	1998	2002
GDP (%)	东部	50.31	53.96	55.54	55.97	57.86
	中部	29.06	26.43	26.09	26.28	25.12
	西部	20.63	19.61	18.37	17.75	17.02
人均 GDP (元/人)	东部	687	3760	8207	12211	17525
	中部	333	1850	3829	5441	7542
	西部	309	1635	3022	4265	5660

资料来源：根据《改革开放十七年的中国地区经济》、1996—2003 年《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计算。

东部基础设施比较完善，文化教育水平高，工业化水平较高，吸收了我
国对国际投资（FDI）的绝大部分，而与之相比，中部和西部发展水平较低，
改革开放滞后，吸收的 FDI 比较少。1978—2001 年，东部吸收 FDI 的份额始
终在 80% 以上，中部和西部的份额分别在 10% 的范围内波动。1994 年以前中
部和西部还难分伯仲，1994 年以后中部和西部吸收的 FDI 规模才有明显的差
距，但这种差距并不大（见图 1-1）。因此，相比较而言，中部与西部吸收
FDI 的差距不明显，而东部与中西部差距却很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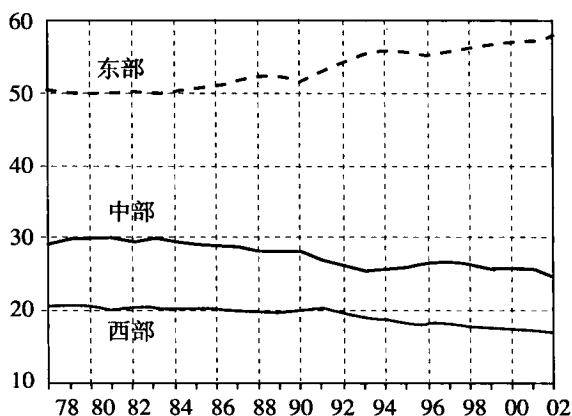


图 1-1 我国区域 GDP 结构演化

造成东西发展差距的原因较多，如有历史、经济、体制和政策原因，但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 1992 年以来，FDI 大量涌入较发达的东部有较大的关系。我国东部吸收的 FDI 一直占全国 FDI 的 80% 以上，中西部 FDI 份额在 20% 以下，1994 年后中部与西部吸收 FDI 的差距开始明显分开，西部所占 FDI 份额一直在 5% 左右（见图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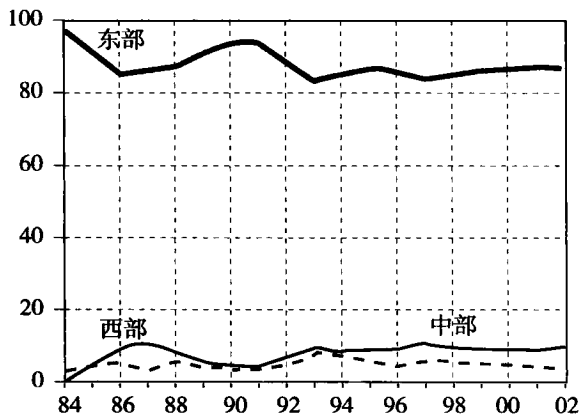


图 1-2 我国区域 FDI 结构演化

不难看出，我国区域 GDP 结构与 FDI 结构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只不过区域 FDI 差距更大，两极分化更明显。在 1984 年以前，东部、中部和西部 GDP 份额基本保持在 50%、30% 和 20% 左右。从 1984 年开始，中部 GDP 份额开始下降，到 1994 年后又趋于相对稳定，而西部 GDP 份额从 1992 年才开始下降。恰巧 1992 年是我国吸收 FDI 的一个转折点。1992—2002 年，我国吸收的 FDI 占我国 FDI 存量的 94.11%。大量 FDI 开始向东部集聚，加快了东部的发展速度。从人均 GDP 看，1978 年中部、西部人均 GDP 分别为东部人均 GDP 的 48.47% 和 44.98%；1992 年中部、西部人均 GDP 分别为东部的 49.20% 和 43.48%。相隔 14 年，中部与东部人均 GDP 差距还略有下降，西部与东部的人均 GDP 差距略有上升，但中部、西部与东部的人均 GDP 差距没有太大变化。然而，到 2002 年，中部、西部人均 GDP 分别为东部的 43.04% 和 32.30%，从 1992 到 2002 年的 10 年间，中部相对东部的人均 GDP 差距扩大了 6.16 个百分点，西部相对东部的人均 GDP 差距扩大了 11.18 个百分点，每年下降 1 个百分点。可见，1992 年也是中西部与东部的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起始点。

显然,我国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实力差距与区域吸收 FDI 差距是极不对称的。从总体上看,1978—2001 年,东部、中部和西部 GDP 份额分别为 55.34%、26.44% 和 18.23%,而同期,东部、中部和西部 FDI 份额分别为 85.95%、8.87% 和 5.18%。如果按同等份额 GDP 吸收相同份额 FDI 计算,那么,东部多吸收了 55.32%,而中部缺口为 66.45%,西部缺口为 71.58%,以西部 FDI 缺口最为突出。

截止到 2002 年,我国引进的 FDI 中东部占 87.84%,西部仅占 3.22%。FDI 是导致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经济增长差异和收入不平衡的重要因素(Sun, 1998)。我国学者(赵晋平, 2001; 江小涓, 2002)的研究表明,地区吸收 FDI 规模的差距扩大是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拉大的最重要的因素。

我国地区发展水平与 FDI 存在一种互动的关系。地区 FDI 与人均 GDP 的计量关系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方面,地区人均 GDP 相差 1 元,地区 FDI 相差 12 万美元;另一方面,地区 FDI 相差 1 亿美元,人均 GDP 相差 65 元。以此估算,2002 年,FDI 直接对东部、中部和西部产生的人均 GDP 分别为 2175 元、332 元和 48 元,分别占当年东部、中部和西部产生的人均 GDP 的 12.41%、4.40% 和 0.85%。我国东部发展水平比较高,市场容量较大,吸收了绝大部分的 FDI,而在我国广大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和生产结构协调能力的欠缺,产业配套能力低和远离国际市场的因素,导致 FDI 在我国中西部流入极慢,数量十分有限,不足以给予当地经济发展足够的推动力。很明显,FDI 在我国的严重非均衡分布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改革开放以来地区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与区域吸收 FDI 差距是极不对称的。2002 年,我国东部吸收 FDI 的份额高于 GDP 份额。同年,西部的 GDP 份额为 13.6%,而 FDI 份额仅为 3.82%,FDI 份额缺口为 72%;东部地区的人均 GDP 为 17525 元/人,西部地区为 5660 元/人,东部的人均 GDP 是西部的 3 倍以上,而东部吸收 FDI 为 454.57 亿美元,西部为 20.05 亿美元,东部吸收的 FDI 为西部的 21 倍。从 FDI 工业(“三资工业”)看,2002 年,我国东部的 FDI 工业份额高于其工业份额,而西部的 FDI 工业份额低于其工业份额,西部 FDI

工业份额缺口为 67.34%。从商品出口看, 2002 年, 我国东部的 FDI 企业出口份额远高于其商品出口份额, 西部的 FDI 企业出口仅占 FDI 的 1% 左右, 也低于其商品出口份额。总体上看, 我国西部 GDP 份额大于 FDI 份额, FDI 企业出口份额又远小于 FDI 份额 (见表 1-2)。

表 1-2 2002 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与 FDI 及其效果差距

地区	GDP (%)	人均 GDP (元/人)	FDI (%)	工业增加值 (%)	FDI 工业增 加值 (%)	商品出口 (%)	FDI 企业 出口 (%)
东部	59.60	15885	86.633	57.862	87.82	91.67	97.04
西部	13.60	5270	3.822	17.015	4.42	3.40	1.04

资料来源: 根据《2003 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计算。

为什么会出现西部 GDP 份额、FDI 份额、FDI 企业出口份额依次递减的现象? 笔者认为, 区域对 FDI 的竞争力由其 FDI 吸收能力 (absorptive capacity for FDI) 所支配, 而这种 FDI 吸收能力是有结构的, 它直接反映区域对 FDI 引进能力、利用能力和扩散能力的整合效应。于是, 笔者提出的理论假说是, FDI 的区域分布可以 FDI 吸收能力差距和结构水平来解说。换言之, FDI 吸收能力是 FDI 区域分布的决定因素, 西部 FDI 吸收能力结构水平低是西部 FDI 发展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

外商直接投资的过程也是我国区域技术变迁的过程。博伦斯坦、格雷高里奥和李 (1998) 认为, FDI 是引进新技术的重要渠道, 其对国民经济的作用超过了国内投资。作为 FDI 主体, 跨国公司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UNCTAD, 1992)。虽然这有些言过其实, 跨国公司不能替代发展中国家东道的努力, 但 FDI 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机会并催化国内投资和提高其能力, 它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催化剂 (catalyst), 是十分宝贵的 (UNCTAD, 1999)。因此, 提高西部 FDI 吸收能力, 加大 FDI 的流入量, 是促进西部发展的一个有效途径。

几年来, 我国正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西部的基础设施有了较大改善, 但 FDI 的流量不但没有显著增加, 反而略有下降趋势。目前, 我国西部处在

一种资本和劳动力推动的经济增长阶段，与东部相比，西部出口竞争力较弱（见表2），处在一种低水平发展循环中，技术约束是比较明显的特征。FDI是一种集技术、资金、管理等于一体的创造性资源，这种“一揽子”的功效可在资本、技术等多个环节上突破低水平的发展循环。这一点已被东亚发展奇迹和我国东部两位数的高速发展所证实。本书研究西部 FDI 吸收能力及其结构，同时提出增进西部的 FDI 吸收能力及结构升级的政策，以吸引 FDI 进入西部地区，加快利用和扩散。这对促进西部地区发展，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二节 研究现状

1992 年以后，随着外商直接投资大量进入我国，FDI 的区域不平衡分布日益突出，FDI 的区位问题也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焦点。国内一些学者应用问卷、统计或计量经济模型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李小建，1996；鲁明泓，1997；冯毅，1999 年；魏后凯、贺灿飞，2001；武剑，2002 年）。在国外，一批学者利用计量模型和方法，对我国省区和区域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进行了分析（Gong, H. M., 1995; Head, K., and J. Ries, 1996; Head, K., and J. Ries, 1996; Sun. H., 1998; Wei Yingqing, Liu Xiaming, Parker David and Vaigya Kirit, 2000; Leoanrd K. Cheng, 2000; Peter J. Buckley, Jenny Clegg, Chengqi Wang and Adam R. Cross, 2002; Qian Sun, 2002）。然而，这些研究集中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动机和决定因素的寻求，并没有更多地探讨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发展的影响。

此外，也有学者对中西部地区的直接投资问题作专门研究。黄晓玲（2003）从理论上分析了受资方和投资方技术水平的差距对外商直接投资作用的影响，并结合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区位条件，探讨了中西部地区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类型，并提出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具体措施。魏后凯（2003）分析了近年来尤其是加入 WTO 后外商在华投资的区位特征及其变化趋势。

近年，吸收能力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杨先明（2000）认为 FDI 吸收能力是发展阶段的函数，随着发展阶段的上升，FDI 吸收能力相应提高，能力

结构得到优化和升级。一般而言, FDI 能力结构越完善, 可引进的 FDI 数量越大, 而我国地区经济发展阶段多元性的特征使我国对各类型的 FDI 产生了各自适应的吸收能力。这一观点表明, 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 FDI 吸收能力及其结构决定 FDI 的数量、质量。丹尼尔 (Daniel Kirchert, 2001) 把吸收能力引入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研究中, 开启了我国区域发展研究的新领域。丹尼尔在《知识扩散和吸收能力对中国地区经济发展 (1978—1998) 的影响》一文中, 提出了“地区吸收能力”的概念, 认为地区对外来知识和技术 (尤其是 FDI) 的吸收能力在地区经济发展中起重要作用, 并建立了线性模型, 其计量检验结果表明, 地区吸收能力与地区经济增长有较高的相关性; 因此地区应对教育和基础设施投资, 提高自己的吸收能力。这是落后地区必须经历的阶段。赖明勇等 (2002) 的《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吸收能力研究》一文是目前国内研究外商直接吸收能力的专门成果。该成果显示, 我国人力资本的丰裕度决定了我国对 FDI 技术扩散的吸收程度, 从而最终影响经济增长。这个结论说明, 我国人力资源差异决定着我国 FDI 吸收能力和经济增长的差异。然而, 该文中所指的 FDI 吸收能力实际上是基于人力资本的 FDI 技术吸收能力。

可以看出, 目前对我国 FDI 区域分布和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寻找 FDI 分布的决定因素, 并对 FDI 的不平衡分布进行解释, 同时从吸引力角度对区域 FDI 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分析, 以我国西部地区 FDI 吸收能力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却仍十分鲜见。

第三节 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主要目标是估计我国西部 12 个省 (区、市) 的 FDI 吸收能力的结构、差距、累积障碍, 并提出促进西部 FDI 吸收能力发展的战略思路与对策。具体目标是:

(1) 建立 FDI 吸收能力分析框架。在经济学中, 能力 (Capacity) 并不是一个定义十分严格的观念, 然而它却开辟了一种研究的思路。社会能力、资源能力、技术能力、吸收能力和核心能力等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研究的不同

领域。在企业研究中,基于核心能力的战略观是一种新兴的战略范式。本书在研究国际学术文献的基础上,吸收了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等的理论成就,把技术吸收能力扩展成地区 FDI 吸收能力,并对其结构效应、成长机制、门槛效应、能力缺口等方面进行研究。

(2) 建立地区 FDI 吸收能力的指标评价体系。地区 FDI 吸收能力评价与度量是区域 FDI 吸收能力研究中的一个重点和难点。目前,在引进能力方面,对我国区位决定因素的计量研究结果是丰富的,如市场规模、基础设施、集聚效应等研究成果对 FDI 区位决策起决定作用;根据目前吸收能力的研究成果,如 Orenshtein, De Gregorio 和 Lee (1998) 以东道国教育水平衡量一国对资本的利用能力的指标, Paola Criscuolo and Raineesh Narula (2001) 以研究与发展 (R&D) 支出水平衡量国家水平的利用能力;信息化水平、知识存量对技术扩散有重要影响。本书在文献研究和理论支持下建立了一种科学、合理的地区 FDI 吸收能力指标体系。

(3) 揭示区域 FDI 竞争力动态机制。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对 FDI 存在一种动态的竞争关系。对 FDI 来说,尽管我国东部、中部、西部的初始条件不同,优惠政策对东部地区引进 FDI 起了先发性促进作用。但从长期看,初始条件和优惠政策并不能改变东部、中部、西部对 FDI 的竞争格局,而起决定作用的是东部、中部、西部的吸收能力,区域 FDI 的流量最终稳定在与其能力相适应的水平上。当然,东部、中部、西部的 FDI 吸收能力变化都影响着全局竞争力结构,揭示这种变化机制对了解西部吸收能力提高对我国 FDI 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4) 提出增进西部 FDI 吸收能力的措施。区域 FDI 吸收能力体系中各种因素的地位和作用不同,还须寻找区域 FDI 吸收能力的决定因素,这对西部 FDI 吸收能力促进政策提出及能力结构提升有重要意义。另外,在东部、中部、西部 FDI 吸收能力梯度中,西部处于最低水平,同时周边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能力也较低,西部在“U”形底部,因而,针对西部 FDI 能力结构因素和周边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能力特点,提出西部 FDI 吸收能力促进和结构升级对策。

在充分吸收目前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书试图在以下方面有所